

ZHOUSHIXIONGDI
YU
RIBEN

周氏兄弟与 日本

赵京华 /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ZHOUSHIXIONGDI
YU
RIBEN

周氏兄弟与 日本

赵京华 /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氏兄弟与日本 / 赵京华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ISBN 978-7-02-008519-4

I. 周… II. 赵… III. ①日本—影响—鲁迅—
1881~1936—文学思想—研究 ②日本—影响—周作
人—1885~1967—文学思想—研究 IV. ①I210.96
②I206.6③K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5427 号

责任编辑:王培元

装帧设计:柳 泉

责任印制:李 博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640×960 毫米 1/16 印张 18.75 插页 2

2011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978-7-02-008519-4 定价 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上编 鲁迅在日本

作为民族自我反省和思想抵抗的鲁迅像	3
——竹内好与丸山升的鲁迅观	
向纵深发展的战后日本鲁迅研究	30
——以木山英雄和伊藤虎丸为例	
后现代社会语境下日本鲁迅像的转变(上)	65
——北冈正子、丸尾常喜之研究的学术史意义	
后现代社会语境下日本鲁迅像的转变(下)	102
——藤井省三、代田智明及其他	
【附录】 记忆的政治学	135
——竹内好“亚洲的抵抗”话语与日本昭和意识形态	

下编 周作人与日本

以固有信仰为中心的学问与文化保守主义	153
——周作人与柳田国男的民俗学思想	

反俗、传统回归与东洋人的悲哀	181
——周作人与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	
周作人日本文化观的形成	207
——与日本泛亚洲主义和东洋学复兴思潮的关联	
周作人日本文化观的别一面	236
——以 1920 年代对大陆浪人和支那通的批判为例	
动荡时代的生活史与心灵记录	260
——周作人与松枝茂夫的往来书信	
【附录】 国家、战争与个人的命运	284
——木山英雄的中日战争时期周作人研究	
跋语	293

上 编

鲁迅在日本

作为民族自我反省和思想抵抗的鲁迅像

——竹内好与丸山升的鲁迅观

引 言

20 世纪中国最具世界性的文学家无疑是鲁迅,而鲁迅在异域其传播影响之广和受到关注的程度之深刻久远则莫过于东瀛日本。《故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选入中学国文课本,使日本大部分国民至少知道鲁迅这位中国现代作家的存在;而在二战以后从灭顶的战败深渊中走出来以谋求民族和个人之新生的日本知识阶层,则更切身地感受到代表革命中国之现代精神的鲁迅其思想文学的强烈冲击力。同样是亚洲的民族且在 19 世纪中叶共同经历了因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而被迫开启现代化的行程,鲁迅及其革命中国为什么能够走出一条与日本截然不同的现代性之路?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包括鲁迅那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下艰苦挣扎、绝望反抗、生生不息、死而后已的抵抗意志,那种承载了悠久的传统和现代史大震荡所形成的复杂万端矛盾纠葛的内在心灵及其文学世界,作为某种历史和精神

的象征得到了大部分日本知识者的认可和敬重。我们记得,在1960年“安保斗争”最激荡的时刻,6月15日,以铁路工会为核心的劳动者罢工示威掀起第二波浪潮,游行人数高达五百八十万。而这天傍晚发生了女学生桦美智子在国会门前被警察殴打致死的事件。就是在这样的时刻,竹内好、大江健三郎等日本进步知识者,连日走上街头或到国会游行,他们默读着鲁迅《纪念刘和珍君》的诗化文字: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以自己的行动向日本国家的倒行逆施抗议!在此,鲁迅对于日本进步知识者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位外国作家,而是作为亚洲共同的精神遗产和思想资源深深介入到该国社会斗争的历史当中。

而鲁迅在异域日本得以深深介入到其社会斗争的历史当中,无疑得益于由竹内好所开创并得到战后一代日本学者继承和深化的鲁迅研究业绩。换言之,战后日本辉煌一时的鲁迅研究传统不仅是一种传播的媒介,它本身亦反映了“鲁迅在日本”被接受和理解的过程。因此,本书“上编”将通过对二战以后六十余年来日本鲁迅研究学术传统的归纳和分析,力图追寻在不同国度和社会历史语境下鲁迅被想像、阐释的踪迹。正因为国度的不同和社会历史语境的相异,日本人所观察到的鲁迅精神面向肯定会与中国人在本国的历史与现实环境中对鲁迅的认识与评价大为不同,两相比较,甚或能够照射出中国鲁迅研究的不足和缺失面也说不定。而一个学术传统的形成需要以下两个必要的条件:一是它需要有一个开创性的原点,一个不拘一格独自建构起思想学术生成之核心的开拓者凭借天才的敏感把握到历

史和现实的脉动,从而提出足以对应时代要求的基本命题;另一个是需要不断有后继者追寻和反思这个基本命题并与开拓者进行对话、交锋乃至激烈的抗辩,又根据时代的变化将新的课题纳入思考的视野,从而逐渐累积起一个厚重开放且脉脉相承的学术传统。

战后六十余年至今的日本鲁迅研究正是这样一个传统逐渐累积起来的过程。为了叙述和讨论的方便,我们将把这个过程划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在1950年代前后,经历过战争年代的竹内好通过再版战争后期创作的《鲁迅》并发表其姊妹篇《何谓近代》(1948),确立起透过鲁迅观察中国革命和亚洲的现代性并由此批判日本“近代”之失败历史的阐释架构;第二阶段大约在1960年代前后,以丸山升、木山英雄、伊藤虎丸为代表的战后日本第一代学人在竹内好开创性的鲁迅论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开掘,筑就了辉煌一时的战后日本鲁迅研究传统;第三阶段则是从1970年代末至今的时期,随着战后日本再工业化的完成,出现了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巨大转变,那种极具思想史意义和政治性与辩论性的鲁迅论逐渐学术化,代之而起的是实证研究、社会史、比较文学、结构叙述学和文本分析式鲁迅研究的兴起,虽然竹内好提出的一些基本命题依然是讨论的重要议题,但通过鲁迅介入日本社会的思想斗争这样一种相当政治化的方法已然退到后台,有关鲁迅的叙述和想像也进入到规范化的纯学术范围。其中,又可以具体划分出略有差异的两个群体:一是属于战后第一代和第二代知识分子之间的学者如北冈正子、丸尾常喜等,他们虽然经历了上述日本社会

的巨大转型,但在学术立场和观察对象的视角方面更直接地承接着第一代学者所开创的传统,其讨论问题的逻辑理路依然处于以现代性为规范内涵的脉络中;另一个是完全属于战后日本第二代知识分子且在社会进入到后现代的环境下接受教育而成为鲁迅研究者的,如藤井省三、代田智明等,他们对鲁迅的思考和理解不仅更加学院化、规范化,而且多呈现出后现代社会的某些基本特征。

那么,在下面进入对1950年代“开创期”的叙述之前,我们先简略地回顾一下直到竹内好为止鲁迅在日本被接受和理解的前史。据学者考证,日本最早对周氏兄弟的文学活动予以关注并诉诸文字公开报道的,是明治中期政教社所办机关刊物《日本及日本人》。1909年5月1日第508号“文艺杂事”栏目中有如下文字:“在日本等地,欧洲小说是大量被人购买的。中国人不能轻易地说受了这一影响,但在青年中还是常常有人在阅读。住在本乡的周某,年仅二十五六岁的中国人兄弟,大量地阅读英、德两国语言的欧洲作品。而且他们计划在东京完成一本名叫《域外小说集》,约卖三十钱的书,寄回国内出售。已经出版了第一册,当然,译文是汉语。”^①众所周知,鲁迅、周作人在东京开始从事文艺活动是在1907年前后,《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出版则在1909年,而《日本及日本人》几乎是在同时注意到默默无闻的两兄弟的文学翻译活动,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值得我

① 参见藤井省三《日本介绍鲁迅文学活动最早的文字》,载《复旦学报》1980年第2期。

们特别铭记。不过,他们作为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界新星而得到日本的注目和评价,还是在十年之后的1920年,即青木正儿发表于《支那学》第3号上的《以胡适为中心的潮涌浪旋着的文学革命》。此后,周氏兄弟的作品特别是鲁迅的小说一段时间里受到在北京发行的日文报纸《北京周报》的关注,而据丸山升的判断,直到1927年鲁迅的小说第一次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国内发表(即《故乡》发表于武者小路实笃所编杂志《大调和》),“可以说到这一时期,除了和中国有某种特殊关系的人以外,鲁迅的名字并不为人所知。”^①

然而,1928年前后随着具有国际主义倾向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在中日两国急速蓬勃地展开,通过日本左翼报刊鲁迅的思想文学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评价,如第三国际特派员山上正义的《谈鲁迅》(载《新潮》杂志)等。到1935年佐藤春夫、增田涉合译的《鲁迅选集》被列入岩波文库,鲁迅开始真正在日本知识者中间被经典化而产生深远的影响。虽然直到二战结束,这种影响依然局限于一小部分人群,但其中有两个极具历史意味并导致鲁迅真正进入日本当下思想视阈的决定性“事件”需要提及。一个是鲁迅逝世后其最早的著作“全集”不是在本国而是在侵略与反侵略的残酷战争爆发在即的敌国日本一方得到刊行,1937年2月到8月日本改造社出版了七卷本的《大鲁迅全集》。这个日文版《全集》在如此惨烈的国家关系和历史背景下能够问世,无疑得力于性格独特而热衷于政治且关心中日两国时局

^① 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中文版第32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的山本实彦社长的眼光和行动力,也有赖于当时日本一般国民乃至知识阶层对时局骤变中的中国之关心。总之,从客观的效果上讲,这部《大鲁迅全集》第一次将小说之外的鲁迅大量杂文随笔介绍到日本,其文化出版行为本身仿佛对战争构成了无声的抗议,并穿越连年的战火岁月成为未来日本知识者理解鲁迅的重要媒介。

另一个是战争进入僵持阶段的1943年,一直关注革命中国和鲁迅而后来成为日本战后重要思想家的竹内好写就了思想传记型的著作《鲁迅》,并于次年公开出版。它不仅突破了此前已经问世的增田涉和小田岳夫的生平传记型《鲁迅传》,^①成为在战后日本真正将鲁迅作为思想资源带入本国历史语境的著作,而且在两个方面推动了鲁迅在日本跨国的影响传播。一个是在日本鲁迅研究的学术领域,竹内好开创了一种研究范型:把“文学与政治”这个自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以来成为主要论争焦点的关系架构作为观察鲁迅的阐释框架,以审视和评价鲁迅思想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文学与政治”的阐释框架具有强烈的现实论争性,包含着知识者如何面对现时代而选择自己的立场和位置这一浓重的文化政治内涵。这使得开创期的日本鲁迅研究不仅仅作为“外国文学研究”,而且也成为直接和本土的文化政治问题关联起来的一项重要课题,引起了学者们长久广泛的关注。另一个是在日本文化知识界,竹内好有意识地将鲁迅的思想作为中国乃至亚洲独有的现代化道路的典型代表,从其“挣扎”意

① 前者发表于1932年日本《改造》杂志,后者由筑摩书房出版于1941年。

识中解读出“亚洲的抵抗”原理,以此来批判日本乃至西方扩张型的现代性逻辑。在日本战后一个时期里,竹内好依据“落后的中国”之现代化经验来反省批判“先进的日本”,这一思想评论的方式和策略使他成为一个重要而独特的思想家。同时也使鲁迅在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这一学术领域之外获得了广泛的认知,那个时代的许多日本知识者正是通过竹内好的论述得以与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鲁迅相接触。可以说,由于竹内好以上两种努力,近代日本的中国学没有哪个时期更像战后时期那样,其研究对象和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如此深深地介入到日本内部的思想语境当中。这当然与帝国日本在二战中的惨败和新中国的成立,促使知识阶层急于向革命中国包括鲁迅寻找思想资源的精神追求有关。因此,下面以竹内好为中心讨论战后日本“开创期”的鲁迅研究业绩,需要紧密结合“战败”与民族自我反省和思想抵抗的历史语境。

如上所述,完成于1943年战火纷飞之中,寄托了自己思想和生命的竹内好(1910—1977)成名作《鲁迅》,无疑是对战后日本鲁迅研究格局之形成最具有影响力的著作。该书初版于1944年,而真正在思想界产生影响则是在该书1946年由日本评论社修订再版之后。与稍后发表的长篇论文《何谓近代》一起,该书不仅使一个“外国文学家”真正进入了本国的历史语境,而且推动了鲁迅研究史上一个辉煌时期的出现。然而,这本《鲁迅》也是最需要将其中的思想课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问题和争论,还原到当时日本的特殊历史情境和思想发展脉络中去的。不如此,我们就会不好理解竹内好何以要这样言说鲁迅,

也很难认识到他的后继者们在继承和否定的同时,开创新的方法论路径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就是说,我们需要把竹内好的《鲁迅》及由此引发的论争作为思想史上的一个“事件”来处理,这一“事件”的背后语境至少有两个:一个是战后的近代主义批判和民族独立即民族主体性重建问题;另一个是发生于1920年代直到1970年代初才逐渐从文坛和思想言论界消失的“文学与政治”论争。如果说前者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思想大背景,那么后者则是直接影响到战后日本鲁迅论的一个基本轴线,这一轴线将作为“外部”的鲁迅与“内部”的日本问题紧紧扣到一起,在研究对象和思考目标之间构成了一种充满张力的关系,从而推动了研究思考的深入和发展。

在战后日本的学术领域,首先挑战竹内好鲁迅论模式的是丸山升出版于1965年的《鲁迅——其文学与革命》和1972年的《鲁迅与革命文学》。而于1967年发表与丸山升著作同名的文论^①,同时对竹内好和丸山升鲁迅论提出批评的,是非中国文学专业的法国哲学研究者和文化批评家竹内芳郎。竹内芳郎的介入受到了竹内好的欢迎,但引来了丸山升的反批评,以及同窗好友伊藤虎丸的声援^②,遂在两者之间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论争。这场论争本身的学术意义可能并不重大,但却有思想史意义上的“事件”性。因此,我们首先将以这场“论争”为切入点,

① 参见竹内芳郎《鲁迅——其文学与革命》,收《文化与革命》,东京,盛田书店1969年版。

② 参见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第三章《鲁迅论中所见‘政治与文学’》,东京,龙溪书舍1975年版。

考察竹内好以及他的反驳者丸山升的鲁迅观,以确认鲁迅进入战后日本并得到广泛传播的状况。

日本战后“文学与政治”论争的思想史语境

自1920年代前后,与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同时传入日本的是马克思主义。它不仅促成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出现,而且给予思想知识界以巨大的冲击。将这种冲击形容为一场“台风”的丸山真男认为:之所以影响巨大,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一种完整的“世界观”体系和“具有逻辑性结构的思想”第一次降临日本知识界的。^① 依据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威力强大的“政治优先”文学次之的原则,因此也产生了对于这个原则的“抵抗”,并在两个层面上引发了论争。一是马克思主义者内部的“政治价值和艺术价值”关系的论争;另一个是自由主义作家群体和马克思主义文学家之间有关“文学主义”与“科学主义”的论争。就是说,论争实际上波及到了整个日本文坛和知识界,而且以不断变换的多种形态一直持续到战后时期。按照丸山真男的概括,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为止的这场论争可以划分出三个不同的阶段:一是1920年代初到1934年前后的期间,即无产阶级文学的全盛期。“作为唯一科学的世界观”之马克思主义和其代

① 参见丸山真男《近代日本的思想与文学》,收《日本的思想》,东京,岩波书店1961年版。

表者的共产党“组织”，针对文学确立起“政治优先”的原则而发挥了强大影响力。二是1934年随着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纳普）的解体，和共产党作家知识分子受到法西斯政治的高压纷纷“转向”，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的期间。“政治优先”原则下的文学与政治关系论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而“科学主义与文学主义”的问题被评论界提出来讨论，在抵制“政治优先”原则的过程中，实际上，自由主义作家群体的“文学主义”形成了强势。因而，新闻媒体有称此时期为“文艺复兴”期的说法。三是到二战结束为止的整个战争期间。由于国家“政治”的强化和战时“新体制赞翼运动”的推进，作家知识分子面临着进退取舍的抉择。包括许多1930年代共产党左翼“转向者”在内的大批文学家开始转向内涵完全不同的新政治（代表民族国家即天皇制的政治）。前一阶段以“科学主义与文学主义”的形式所提出的“文学与政治”问题淡化下来，代之而起成为论争焦点的是文学如何更直接地与政治相结合。另一方面，在日本文学报国会（1942年5月组建）和大东亚文学者大会（1942年11月第一次大会）等法西斯文学成为潮流的同时，也有一些反感于这种为“国家政治”服务的文人以“文学主义”为旗帜默默地与之抵抗。

具体到竹内好当时的思想立场和写作《鲁迅》的时代背景，木山英雄更直接地指出，从1934年开始对东京的“汉学”之儒教意识形态和京都“支那学”之客观主义解释学发起批判，到作者1943年完成《鲁迅》的写作而被送到中国战场为止，大约这十年间：

正值无产阶级文学由于受到彻底镇压而归于毁灭，作